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基本经验

□ 肖浩辉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 80 多个春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找到了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认真总结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成功经验 基本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5675(2008)01- 079- 06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而严谨的科学体系,它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断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革命和建设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1]所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用唯物、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三大理论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念。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一贯立场。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丢掉老祖宗,就会迷失方向,犯下大错误。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认真阅读研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提高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坚持用马

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态度:一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3]我们党正是坚持了毛泽东提倡的这种科学态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江泽民也反复强调: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我们党正是不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科学态度,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 作者简介:肖浩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湖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03。

化不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只有以发展眼光、变化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和拓展。思想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可易移的教义,理论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前进。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4]正由于邓小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变了人们头脑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而必须从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不能断章取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片面地、孤立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三大理论成果根本原因。

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概念,前者是表达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动态行为方式,后者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倡导者。他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批评了当时在干部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一种是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6]邓小平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他强调:“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够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7]“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8]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明确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9]“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0]我们党正是在坚持理论同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反复循环的运动过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向全党倡导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上坚持了这一根本原则,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作为一个过程: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然后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符合的坚持,不符合的纠正;再就是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提出新理论和新政策指导新的实践。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样反复“结合”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不断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重视用发展着的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党能够与时代发展潮流同步的深厚根源。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关键。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彻底唯物主义者,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注重实际。所谓实际,包括世界、中国和党自身的实际,也就是世情、国情和党情。只有弄清这三个方面的状况,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正确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革命和建设的,只有正确判断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正确制定自己的战略策

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判断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时代脉搏和基本特征,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使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对象有其特殊性。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据。这里所说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等。我们党正是在不断研究和正确判断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构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特点和风格的理论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适应这种变化,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世界的潮流和国家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领导全国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性工程。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周密调查研究。所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工作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率先垂范,带头深入城乡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许多新理论、新政策,都是在调查研究中产生的。比如毛泽东的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是他在农村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理论和政策,是对沿海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江泽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是他对城市和企业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

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既在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在失误和挫折中汲取了深刻教训。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科学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党不

辱使命,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灵魂。列宁和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邓小平也常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我们党在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紧紧把握住这个灵魂,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我们没有照搬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自己原来实行过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也随着实践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借鉴苏联的做法,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在长期实践中,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和江泽民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果断地作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可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保证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之举。

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泉。任何新的思想都是从已有的思想出发的。人类文明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继承关系,就其形式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第二个层次是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第三个层次是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

这种继承关系,就内容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以及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一是理论精髓的共同性。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的继承,也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

承。这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是我们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钥匙。二是奋斗目标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规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以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己任,前赴后继地为实现奋斗目标而拼搏,在实践中以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指导思想的连贯性。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连续性。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连续进行的。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开辟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接着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是壮志未酬,就与世长辞了。这个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邓小平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事业,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取得了新胜利。这种探索是没有止境的。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继承了党的事业,开展了新的探索,使党更加生机勃勃,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坚持继承、捍卫和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一个重要公式。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事业的坚定继承者,在任何时候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捍卫者。我们党曾经批判了各种危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牢固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拓创新者。坚持在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工程。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按照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于突破陈规,勇于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观点,

形成超越前人的学说,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体系。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新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找不出这样的现成答案。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差异。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合。在这方面我们党的领袖做出了榜样。比如: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国本”、“民贵君轻”的思想融合起来,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主张,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提升和改造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使其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传统文化则通过整合、重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基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的融合。毛泽东曾经针对有些人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华民族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都具有这种鲜明特色。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语言的融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中,没有晦涩的西方式语言,没有深奥难懂的词句,而是运用通俗易懂、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深刻的思想和观点。比如毛泽东用“箭和靶”的关系形象地比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表达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深刻道理。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

是好猫”等生动形象的通俗语言,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易于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接受。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中国语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特色,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重要标志。

五、坚持群众路线依靠集体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源泉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就决定了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量吸取群众实践经验的产物;是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的第一源泉。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人,他们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特别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极大地释放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使他们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过程中,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结合起来,爱护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经常深入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把群众实践的经验条理化、系统化,上升为理论和政策,用来指导全党的行动。比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毛泽东总结鞍山钢铁公司的经验,向全国倡导的。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民根据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的长期实践经验创造出来的。最先发明这个办法的是安徽凤阳的农民,当时被视为“异类”。邓小平发现的这一新生事物后,积极而谨慎地扶持这个新生的幼芽,并认真地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正确引导和完善,逐步为全国农民所接受,形成一场席卷当代中国的农村改革高潮。

智囊的智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囊是指具有文化水平高、理论水平高、科技水平高、专业知识丰富的群体。包含高等院校专家教授,各种科研机构 and 信息机构的高级研究人员,领导机关的秘书班子、参谋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高级专业人才。这是一个高智商的、知识密集的、能提供大量智力服务的群体。他们在领导决策、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领导集团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谋和得力助手。特别是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领导者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且还要善于借用外脑,把智囊的智慧为我所用。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非常珍惜这些具有特殊知识能量的群体,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支持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骨干力量。

领导集体的智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

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领导集体充分讨论,在完全一致或大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它集中了领导集体所有成员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中就包含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正确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包含当时领导集体成员中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不仅善于集中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而且善于集中地方各级领导的智慧,注意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比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在听取34个部委和部分省市领导的汇报,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吸取苏联片面重视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符合实际,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不仅重视从现实经验中吸取智慧,而且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对我党在两个不同时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对于统一全党认识,提高全党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六、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既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同危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我们吃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亏,也受过自由化思潮和思想僵化的干扰,还遭受过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神圣化的亵渎。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排除了干扰,端正了航向,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胜利。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建立的初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脱离中国实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炮制了“二次革命论”,即先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强调中国革命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武装夺取政权的轨道。但是如何武装夺取政权?又产生了重大分歧。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照抄本本,照搬俄国城市暴动的经验,搞“左”倾盲动主义,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挫折和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他严肃地指出: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在实践上纠正了城市暴动的错误,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我们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注重外国和外地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不注意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就必须反对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凭自己狭隘的经验办事的经验主义倾向。毛泽东严肃指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吸取外单位、外地或外国的有益经验,夜郎自大,盲目自满,其结果必然会变为一个不清醒的、盲目的工作者,也会妨碍党的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他倡导有实际经验的人要注重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采取割裂、歪曲、篡改的卑劣手法,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马列和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搞乱了人的思想,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邓小平针对他们割裂、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严肃地指出:要在完整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主观臆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更不能歪曲、篡改,强加于人。他反复强调: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反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少数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倾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旗帜,要继续高举毛泽

东思想旗帜前进。后来又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邓小平同这种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强调: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个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也坚定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正是由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反对思想僵化的倾向。由于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化,讲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加上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等因素,导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这个错误方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2]“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通过反对思想僵化,促进了全党和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以上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不一,危害程度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离。针对这个特点,我们党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武器,战胜了各种错误思想,把全党的认识引上了正确的轨道,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67页。
-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47页。
-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01页。
-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9页。
-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13页。
-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 [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70页。
- [10]《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2页。
-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8、39页。

责任编辑:刘峰